

前 言

高举爱国主义旗帜、搞好文史资料工作，是一项承先启后继往开来和惠及后世的光荣事业，是人民政协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新的历史时期为扩大和巩固爱国统一战线，为我县四化建设提供史料借鉴，具有重要意义。

我县政协自一九八一年三月成立以来，对地方史料进行了征集整理，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由于党委的重视和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热忱赐稿，现编成《北川县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刊印十篇，四万余字，奉献读者，其目的在於保存地方史料，有利於对青少年进行今昔对比的教育，以提高思想觉悟，促进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今后还将陆续选编成辑，敬请一切有条件撰写或提供文史资料的同志，对我县政治、军事、文化、科教、工商、民族、宗教、社会革命史等方面的史料，本着求实存真，实事求是的原则，积极写稿，使稿源和内容更加广阔和充实。

我们征集、整理文史资料编辑出版工作，由於起步晚、力量不足、加之水平低，难免有疏漏和错误之处，请批评指正。

政协北川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组编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

目 录

- 一、北川和平解放……………魏景虞口述陈德佑整理 (3)
- 二、陈绍虞率众反抗高利贷……………母广源 (8)
- 三、忆神禹故里……………钟怀玮口述陈凤翔整理 (24)
- 四、北川县西北两区少数民族的演变及重要事迹……………
……………王朝义 (26)
- 五、北川县一九四二年举办学生体育运动学科观摩大会概述
……………姜定周 (47)
- 六、北川县创办中学的亲身经历和感受……………王朝义 (54)
- 七、“鸡捐”款与买田是怎么一回事……………周兴富 (60)
- 八、竞选伪国大代表的经过和背景……………张 羽 (63)
- 九、经营边茶茶号在北川的兴衰目击记……………孟 倪 (66)
- 十、习日片口场人称“小成都”……………肖天崇 (73)

北川和平解放

魏景虞 口述

陈德佑 整理

一九四九年春，我因身多病，辞去了北川中学校长职务，在家休养，对于国内战局，颇为留心。北川地处偏僻山区，交通闭塞，消息不灵，当时仅有国民党四川省报“新新新闻”可资参考。然所登新闻，大多为蒙蔽视听之欺骗宣传，借以安定人心，企图稳住阵脚。但全国各大城池相继解放，解放地区日渐扩大的事实县人则口有所闻。继四八年国民党在东北、华北全面崩溃之后、四九年四月、解放军突破长江天堑直捣国民党老巢——南京；迅即进军西北，挥师华南。国民党军大多溃退西南，大有负隅西南之势。设若狗急跳墙，发生激战，则四川受害深重。故此人心惶恐，只好各自逃避。

十二月初，传来重庆解放消息，川北防线崩溃、国军南逃；广元、剑阁、江油相继解放。溃军乱窜，冬月初四日已及安县、永安、内鼓，我即将妻小送离县城约四十里之魏家山亲戚家暂避，自己孤身留守，必要时再上山与家人相聚。只半天时间，城中百姓几乎走空，空气十分紧张。过了两天，并未发生什么情况，有部份人又陆续返回。

冬月初八上午，伪县府突派人通知我，说江油有人在电

话上找我谈话，要我去接。接谈后，方知是早年读书时一位老朋友朱康民。朱乃中坝人，住太平场。其兄朱世先是我在中坝读省二中的同班同学，我常去他家，彼此认识。后在成都又与其兄在高等工业学堂同班同科。康民时就读华西大学医科。当时在成都设有由江油、彰明、平武、北川四县联合成立之“龙属同乡会”凡四县旅蓉者均可参加集会，故与朱康民弟兄过往甚密，交往较厚。解放后不久，他就任南充市人民医院院长。

他告诉我，江油已经解放，成立了人民政府，问我们北川是否愿意和平解放，希我们马上派代表去江油谈判。因电话设在县府，北川尚在伪政权控制之下，不好多谈，我只好答应立即找伪县长和县中人士商议之后很快派代表前往。与伪县长范物安（新都人、黄埔生、少将军衔）谈后，便邀集县府官员、县中绅、商各界人士二十余人 在县府会议室开会。会上，均认为北川并未驻扎部队，更无地方武装，和平解放乃全县人民之愿望，一致赞成派代表去江油谈判。同时觉得我在江油有较好的人事关系，当为最合适之代表。但想再推举一至二人同行时，则都畏缩俱怕，无人敢于担当，冒此风险。最后只好推出母登瀛，但母不在县上，要我去江油路过邓家渡时，去母家中约与同行。

当时北川既无国军，解放军又未到来，伪县府已经瘫痪，官员们都为自己今后前途打算，惶惶终日，各地土匪，肆无忌惮，到处抢劫、旅途十分险恶，但已负县人重托，身系北川安全，即使发生意外，亦再所不虑，决心 前往。于是作书与妻儿告别。当晚一些亲朋知己都来家安慰嘱托，谈到深夜方散。初九日临行，又有多人到索桥头送行，有的甚至下泪。

下午抵邓家渡，留宿母宅。我向他转达了前日会议情况和县人嘱托。母须未明言不去，但态度忧疑，似难抉择。我又同他分析估计情况，认为须有困难风险，但确有可能完成使命。决定第二天同往。初十日动身时，因他以骑代步，行前尚须对一些重要家事稍作安排，故约定我先行，他将随后赶来。我路过陈家坝时，街上居民几乎走光，找顿饭吃都不容易。当天经桂溪、甘溪到达官渡（即今江油县大康乡），朱康民已在此专候。晚上受到朱和当地人士的热情欢迎和款待。

冬月十一日在朱康民的陪同下去江油县城（即今江油县武都镇）。当时江油解放建立人民政府时间须短，但市面秩序井然，解放军纪律严明，人民政府干部生活俭朴，工作勤恳，平易近人，与国民党官兵比较，使我对共产党、解放军钦敬之情，不觉油然而生。我到达江油不久，母登瀛也随即赶到。

在江油住了两天，经朱康民安排与张秀熟、蹇幼樵、傅子东等人相见。张，平武人，后任川西行署教育厅长。蹇，江油人，后去川北行署工作。傅，江油人，后任川北行署教育厅付厅长。张、蹇均为早年成都尤属同乡会经常会见之熟人，付须初会，但以往彼此知名。他们都住蹇宅，正忙于协助人民政府开展各项工作。朱是否共产党员，不便探向。他之打电话找我，纯系张朱等人对北川人民的关心，也是他们协助党工作的内容之一。熟人相见、互道寒暄，交换各自县中情况，解释共产党、解放军的各种政策。就在蹇宅与江油人民政府县长张大甫同志进行了简单的谈判。所为谈判，双方均无什么条件，也无详实纪录，其内容大体就是由我们代表北川

人民表示诚心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希望和平解放，尽快建立人民政府，安定局势，恢复人民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这些请求当即获致允准，同意不派部队进驻北川，只派工作人员来县主持工作。会后发给我们一大卷文件和宣传材料，其中主要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在回县的路上，我便一路张贴、一路宣传，到了陈家坝时，人们听说北川可以和平解放，欢欣鼓舞，下乡的人纷纷回家。王芝锐同志适因陈家坝锄霸事件负伤，住乡下调养，亦立即赶回街上相见。在欢迎会上我向大家报告了江油谈判概况，并以亲见亲闻之感受作了宣传演讲。在回县途中遇见伪县长范物安也去江油，他是因剑阁专区伪专员刘戡要派一个保安大队进驻北川，要他去接，但部队还没开到绵阳便向解放军投诚被改编了。

我回到县上时，安县北支队几百人已于冬月十一日陆续来到北川，到达后约五〇年元旦。所谓北支队，除曲山曾旭初外，全是安县人，其中有些袍哥由北支队司令员刘丕承（安县伪国大代表）。召集了伪县政府人员和少数县上人士约五六十人在伪县参议会礼堂开庆祝会，正式宣布北川解放。这些人住在城内，鸣枪放炮，致使人心惶恐不安。我家设了司令部，住满了人，也只好去朋友家暂挤。少数商人为了地方安宁不得不出面应付，自己出资为那些“军官”备办伙食。

我回县约隔四天左右，即有解放军62军从安县派来两个排，一驻小坝、一驻治城，未与地方人士接触，北支队离开时，也随之开回安县。1950年1月15日，共产党从江油方面即派来刘仲成、高尚福、李指明、严朝炳、郭永瑞、阎述强、李树荣、薛在玉、刘逢云（后薛、刘二人被判匪杀害）等

九人来县。这时北支队大都陆续返回安县。又听说共产党真的来了，不少人又产生了恐惧心理，避往乡下，只我和少数几个人出而到“接官亭”（旧时迎送官员之地，早已无亭，只存地名）去迎接到县政府，并为之安排筹办供给。经短期筹备，很快成立了北川县人民政府，刘仲成任县长，母广轼任付县长兼公安局长，我也就此在人民政府领导下协助开展各项工作。从此，北川才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建立人民民主政权，真正得到了解放。

一九八四年九月十二日

陈绍虞率众反抗高利贷

母广源

清光绪前，陕西人和成都马鼎立(回族)先后来到石泉县让乡所属陈家坝经商。开初主营茶叶，运销陕、甘、松、茂等地。后来酒、油、烟、布、粮、肉、糖、针头麻线、香蜡线纸什么生意都做，并开钱庄放高利贷。光绪十年左右，他们在陈家坝相继开了八个商号，名曰：万生号(何万生)、荣生号(邹云生)、大顺号(焦大顺)、义生号(管义生)、丰盛号、裕和号、义和号和鼎立源(马鼎立)，人们简称八大号。

这些商号专门从事商业和放高利贷，惟义生在耆老坝买有少量田地，其余的只典押土地、菜园、桐林。他们经营茶叶、桐油、菜油等土特产品。一是买期货，二是来了外商就抬价，没外商来则拼命压价，基本上垄断了陈家坝的经济。“八大号”卖东西，现金交易的价格低，赊帐的价格高。放债主要是通过赊销，赊帐要找一个家绅较好，一般尚守信用的人担保，出具借约，方能拿走买的东西。向“八大号”借粮食，要借就要借一仓、一囤、一桶，他们指定容具，说多少就是多少，不借作罢。不借那么多的，只好转借他人。钱、粮月息一至二分，年息三至五分。对到期还不清或还不起本息的换约为据，本利相加跟滚雪球样，日积月累，逐渐

放成了“铺山帐”，欠帐面达百分之八、九十，负债银一说一万多两，一说十多万两。“八大号”逼债如狼似虎，常常捆绑吊打欠债人，更为恶劣的是在热天将欠债人捆去太阳晒，还不准喝水；落雨天绑在露天场地露让雨淋；冷天绑去露天冻，关在粪水齐胸口以上的毛坑里。打伤不负责任，打死一人赔偿命价银20两。

陈家坝人，对这种惨无人道的野蛮行径，历历在目，仇恨在心，埋下的雪恨种子在发芽、生长，孕育着一场反高利贷斗争。这场斗争先在古儿山陈家、回家山林家、兰池子熊家、兰家坪母家等家族中酝酿并逐步串联起来，采用明拖暗抗的斗争策略，如“八大号”下乡收账的人少，若是无礼，就以棍棒逐之；来的人多，当家人回避，老小父孺出面应付。事态发展日甚，“万生”、“义生”、“裕和”等号见势不妙，认为帐不一定能收起来，钱也整肥了，欲囊括回陕西，就将所有债权照本卖给了“鼎立源”。在遭了大灾荒后的穷家小户，无不啼饥号寒，嗷嗷待哺，那还有能力还债。“八大号”乘人之危，特别是“鼎立源”的老板马鼎立逼债更凶，专从成都请来一个拳术老师，教他拳养的那批走卒学打拳，耍刀、午棒。同时，改变过去一两个赤手空拳的人下乡收账为八、九、十 那人一路，持刀握棒逼债。这些人到了欠债人家，估着要吃肉、喝酒、烧大烟，只要听说句给不起、缓几天之类的话，除打骂外，便搜寻财物、拉猪牵牛、捉鸡系猫、形同强盗。

陈绍虞率众打“八大号”，一说发生在遭了大灾荒的第二年，一说是光绪十八年（1892年）的一个赶场天，“鼎立源”号里的人用皮鞭驱赶坐在它街檐和茶包上乘凉的老百

姓。在场的陈绍虞和邓家的母四贡（名泽培）见此情景，义愤填膺，怒不可遏。陈绍虞出面劝阻、反遭辱骂。陈、母商量后、便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陈绍虞一声喊打，话音未落，董文彩（外号董大劲）举起一包茶扔进了“鼎立源”铺子，打烂了油缸酒缸。这下捅了马蜂窝，“八大号”的老板、先生、学徒等人，手执棍棒，蜂涌而出，不分清红皂白，见人就打。赶场的老百姓，新仇旧恨一齐涌上心头，也不约而同地打了起来。在孟家茶馆吃茶的人，来不及找棍棒把棒子、板粉腿腿拔掉，人手一根，见“八大号”的人就打。

“八大号”毕竟人单力薄，敌对不过，便使用刀矛。群众毫不畏惧，仍以棍棒、石头还击；刀、矛尚未近身，石头、棍棒早已打到持刀、执矛者身上。“八大号”受伤十多人，眼见打不赢，拼命钻进各自号口，将门紧闭。群众便将“八大号”围住、骂的骂娘、喊的喊话。这时，陈绍虞告诫乡亲们：一定不要打死人，不要烧房子，不要进“八大号”的门，不要“八大号”的东西。若被反咬一口，那就百口难辩。“八大号”在被包围中，派人身披一床铺盖，突然从门口冲出来，出门就撒几把银元、铜元，满以为守在门口的人要去拾钱，自己既可以安全逃走，又可以藉词诬陷。那晓得群众才不去拾钱，还是要打。出跑来的人有被盖保驾，挨上几棒也无关紧要。对跑脱了的人、不去穷追，让他去吧！只将丢下的银元、铜元、被盖等物收拾起来、有的在被盖上弄些大粪、泥巴之类的脏东西，如数丢进“八大号”里面。围了半天一夜，陈绍虞认为久围必然劳民伤财，就叫群众回了家。此后，“八大号”再不敢任意欺侮老百姓了，在街上收账也没有那么凶了，更不敢派人下乡逼债。

打“八大号”这天，唯独马鼎立不在陈家坝。他得知情况后，便去石泉县公署告状。一告便准，县衙派人来抓陈绍虞。陈绍虞的这一壮举，不仅得到老百姓的拥护，也得到杨洪发、马五老爷等上绅的支持，曾多次给予资助，并一再向官府反映实情，为陈绍虞减轻“罪责”。当然，他们支持打“打八大号”是另有目的，既能笼络人心，又可消除经济上的劲敌，以便自己扩充实力。官府要捉拿陈绍虞，本地方人要千方百计地保护，逐步形成了以复兴团（陈家坝街周围）、永积团（张家沟一带）、岗常团（大竹山、马家坝等地）为基本的民众武装，公推陈绍虞为首领。平时照常做庄稼，只有一两人跟随陈绍虞。如果有警哨、县上来了人，以鸣铁炮三响为号，一处鸣炮，附近的团再依次鸣炮。群众听到炮声，放下一切活干，就向事前指定的地点集聚。一次县上派出练勇、差役一二十人，去观音堂逮捕陈绍虞，聚集在这里的一百多人，当练勇、差役走到观音堂前面的河坝里，就打了儿土台炮，这些人的面前沙石乱飞，再也不敢前进了。陈绍虞得百多人磨即转移到赵家梁。次日，练勇、差役又去赵家梁捉拿陈绍虞，还没走到青杠林，滚木雷石密如雨下，吓得抱头鼠窜而回。群众又将陈绍虞护送去老母顶。在陈绍虞未就“犯”的一年多里，多数时间住在群众基础较好、给养莫问题、核心人物杨善兴，张金志（大竹山人）、母延宪（兰家坪人）、林启先（笼头山人）等易于集中商量事情的大竹山庙和观音堂。

县公署公开捉不到陈绍虞，便令差役化装秘密逮捕。一次，差役在笼头山捉住了陈绍虞，黑夜才押到陈家坝街上。这天晚上陈家坝正在唱戏，差役将陈绍虞押去戏场找头人，

觅个地方关人。群众看见陈绍虞被捕了，急中生智打起假架来，戏场秩序募然大乱，趁机将陈绍虞抢走了。

官府捉不到陈绍虞，焦急如焚的“八大号”，就改变主意，策划暗杀。一次，用重金收买了陈的亲信张大进和另一个刺客。张大进给另一个刺客交待的暗号是床底未放脚盆的那头，就是睡的陈绍虞。这时间陈绍虞和张大进常住在观音堂佛爷神像后面屋里，一般都是张大进后洗脚，将水到了，脚盆放在自己睡这头的床下面。刺客来行刺的这天晚上，恰恰是陈绍虞后洗脚，脚盆放在自己睡这头的床底下。刺客便对准睡在床下未放脚盆这人头上一刀，误将张大进杀死了。再一次，“八大号”又收买了两个刺客，其中一个姓赵的，与陈绍虞比较亲近。一天晚上陈、赵两人住在大竹山前殿，姓赵的睡得很熟，而陈绍虞觉得被什么咬伤睡不着，悄悄去到娘娘殿。不多时，只听到唉哟一声，说了句是我。陈绍虞等人走来一看，此人头上挨了一刀，医治无效，呜呼哀哉。陈绍虞两次幸免于难，相传是菩萨保佑。非也！焉独有偶，巧合所致。当时，还流传着耐人寻味的话：人做亏心事，害人终害己。至此，“八大号”还誓不干休，重施故伎，出银数千两，欲收买昔年学过武的徐老汉（禹王宫住持）。这人虽穷，但重义轻财、不为钱财所动，严厉训斥“八大号”使者，断然拒绝。

陈绍虞被群众营救走了，知县出巡陈家坝。听说赵知县是陕西人，怀疑他定会偏袒陕商。“八大号”也乘机行贿，送给赵知县纹银八锭。事后老百姓知道赵知县拒收贿赂，秉公正直，称赵知县为“赵青天”。“八大号”连遭挫折与失败，脑羞成怒。去打上控，接二连三地去四川督察署、巡抚告

状。光绪十九年，四川总督派把总一员率壮勇40名，来陈家坝逮捕陈绍虞。陈家坝人一面扛炮（土台炮）、握刀、执矛，拿起棍棒秘密集合于对河两岸的险要地方，相机行事，若把总要强捕硬捉，就以武力保护；一面采取后发制人，不阻挠把总，壮勇行进，并请当地约总、士绅等头面人物迎接，热情款待，争取把总同情，转禀上峰。在迎接把总到来时，鸣土炮数响，以示欢迎。各为礼炮，实则示威。老百姓只等把总住下，络绎不绝地去为陈绍虞喊冤，去告“八大号”的状，首当其冲的便是“管符”禹元奎。把总听民诉、查实情、看动静，认为要捉陈绍虞并非易事，还会引起大的骚动，就一再向约总、士绅和去喊冤告状的老百姓说明：答应向上峰转告实情，但这案子事关重大，拖下去总不是办法，至少要去县衙才能解决。陈绍虞深明时世，体贴乡邻，挺身而出，去见把总。把总将陈押解到县公署，赵老爷升堂审讯，问陈为何闹事？陈绍虞剴切陈辞，我一未杀人，二未放火，三未抢劫，四未盗窃，何谓闹事？常言道：欠账还钱杀人填命，老百姓欠“八大号”的账，欠账不欠命。“八大号”逼债，私施酷刑，草菅人命，百姓坐一下他们的街檐和茶包就遭毒打，实在欺人太甚。我叫人打他们是为民除恨，以示惩戒。遇到清官，我一人搭桥，万人不失足，……。一席话说得赵知县无言以对，只得将陈绍虞丢监。

陈绍虞坐牢一年多，百姓慷慨相助，去人看望，送钱送物，问寒问暖，精神安慰。母庭冤代头聚众喊冤，群众自由结合喊冤一起接着一起，有时一天数起，银发老头、白发老奴跪在大堂上不起来，弄得赵知县没奈何。告“八大号”为富不仁的状纸宛如雪片飞进县衙门。冤喊告状的人多了，就在县

城吃“大户”。赵知县左右为难，不知如何措是好，冥思苦索终于想出一妙计：请陈家坝的士绅扬洪发、扬绍松父子到县公署，盛情款待，软硬兼施。一面吹捧扬氏书香门第，仁德父子，关心桑梓，体邻乡人；一面施加压力，以地方安靖，责无旁贷，陈绍虞聚众闹事，让其住在家门口，支持纵容其不轨，更何况扬氏家族欠债最多为由，并以释放陈绍虞为条件，要扬家父子买账。进而以名利诱导，买帐账在，日后收回，一本万利，赎回陈绍虞，大得人心，岂不是两全其美，名利双收。扬洪发父子处境尴尬，进退两难，权衡后果，愿吃敬酒不吃罚酒，同意买账。扬家父子与“八大号”的代表马鼎立等人，当着赵知县，讨价还价，磨破嘴皮都达不成交易，最后还是赵知县一口咬断，买卖账银三千两。扬洪发父子提出要求：一次给不清要分期付款，这次给一千两，要“八大号”交出代来的帐簿，回到陈家坝交出所有文书契约：请求知县即刻释放陈绍虞出狱了。

“八大号”在陈家坝给扬洪发父子交文书约据，在交接的当天约据被焚。焚约底细，一说是扬洪发父子认为：买的这些账是收不起来的，收账会激起众怒，自找麻烦；更重要的原因是给不起尚欠银二千两，便与陈绍虞等人密谋，决定在双方正在交接而尚未接交清楚的时候，来些人把纸约、账簿弄去烧了，造成赖账口实。一说是耆老坝杜某出的主意，即所谓一纸墨笔半壁河山，官凭印信，民凭文约，把约据烧了，“八大号”和扬家都拿不出把凭，都不敢要帐，若是要账叫他拿出文书纸约，拿不出来，我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不欠谁的账。此举果然凑效，烧了纸约账簿后，扬洪发父子未向老百姓要过买的这笔账，“八大号”也未向扬洪发要到尚欠银两，

从打了八大号以后，多数百姓不去八大号买卖东西。这些商号的生意自然尚条，兼之收帐无望，只好离开陈家坝，除荣生号周家在堰上竹瓦房落户外，其余的都返回陕西。走时杨洪发“赠送”了少许路费。

陈绍虞假释返乡时，陈家坝数百人敲锣打鼓、挂红放爆竹到石岭岭迎接，陈绍虞家境贫寒群众在陈家坝街上给他修了三间瓦房，开茶馆谋生。光绪二十八年水打陈家坝街，他的房子又被水冲毁了。乡亲们再次帮助他在古儿山重建家园。只要听说他有大烦小事，都乐于相助。逢年过节有不少人去他家看望，有的还接到家里待为上宾，走时送些东西。陈绍虞的妻子死后，他就与贯岭罗家居孀上门，小贸为业。生养女儿三个：大女与平通楠木园李某结婚，二女与平通杨发银（铁匠）配偶，后裔扬述详、扬菊详；三女嫁给陈家坝竹麻林赵万金，后代赵宗信等四人。

陈绍虞为众义举，乡亲们送他一道横匾作为纪念。杨洪发乐善好施，指资焚约，据说圣谕批封为奉直大夫，死后入宗烈祠。

陈绍虞民国二十七年卒于贯岭，终年八十多岁。

几点考证

《陈绍虞率众反抗高利贷》一文，是根据一九八三年二月三日、八十一岁的吴万明，三月七日、八四岁的王心质，三月二十二日、八十岁的李德山、陈洪秀（陈绍虞的侄女婿、侄女）俩佬，一九八四年八月二十七、八日、八十高龄的刘仁周，八四年九月八、十日、八十五岁的陈洪志和陈绍虞的外县赵宗信等人提供的口碑材料整理的。他们都未亲身经历过这件事，除赵宗信都出生在光绪二十多年，能记事时间与之较近；在打了“八大号”的若干年后，他们的前辈在社会、家庭常谈此事，时近则迹真，所以他们听说的较为可靠。由于各自的阅历不同，闻知多寡有异，但几位老人都能说个梗概，尤以王心质刘仁舟提供的资料多而详，因为王心质的外公扬绍松亲身经历过这件事，王又在外公家住的时间长他听他外公和舅父扬光祖传闻的多；刘仁舟年纪大，在世面上生活的时间长，阅历深，传闻亦不少。事过九十三年老年老人还能较清楚的记得打“八大号”的过程，可见陈绍虞率众反对封建剥削的这一壮举，可谓感人肺腑，他们无不说陈绍虞见义勇为，为陈家坝的穷人打掉了子孙都还不清的账，是个难找的好人。

口碑资料有一时、一事多说，又恐事隔久远，记忆有误，必要作些考证。现将几点考证分述如下：

一、打“八大号”一说遭了大灾的第二年，一说是光绪十八年。是不是发生过大灾荒？发生大灾荒的第二年，又是不是光绪十八年？时间是否吻合？《北川县志》民国二十一年本杂异志第五篇记载：“光绪十六年，雨阳不谐，农无收

获，至十七年大荒，……沿途饿死饥民甚多，光绪十六年农无收获，十七年发生大荒这是符合情况的。发生大荒的第二年，就是光绪十八年。两种说法不同，但时间是一致。

二、陈绍虞率众反抗高利贷时的在任知县是不是姓赵？陕西人？为官如何？《北川县志》民国二十一年本官师表第十篇载：“……郑铨字问楼，光绪十五年任，赵棣字萼楼，陕西渭南举人，光绪十九年任。陈锡沛字根雨，光绪二十七年任……。“从上述文字记载可以认定：打“八大号”是在郑铨任知县时发生的。赵棣从光绪十九年至二十六年任北川知县，长达八年。知县姓赵确有其人，原籍陕西无误。陈绍虞率众反抗高利贷，从始至终有三年多四年时间，其时多在赵棣的任期中。同时、对赵知县出巡陈家坝，要扬洪发父子买账等情节也能作些佐证。赵棣为官清正廉明，拒绝贿赂，秉公正直，是否有其事，我不能也不敢武断定论。这里抄录一段《北川县志》供独立思考。民国二十一年本杂意志第二十八篇第四行款令治绩：“赵棣字萼楼，陕西渭南举人，……赋性刚，执法严，种桑劝农，邑人称善”。

三、扬洪发父子买账之说无二，《北川县志》也有记载，民国二十一年本杂意志第三十三篇写道：“扬逢春，一名洪发，乐善好施，捐金焚券，乡人义之。子沛然、继美称贤，书香世家。”口碑之说是买账、文字记载是捐金。从口碑资料来看扬洪发父子买账是被迫的，不得已而为之。文字记载为捐金、只不过措词溢美，买帐与捐金，虽用语不同、但无实质差别。

四、焚毁约据之说有三：《北川县志》记载为“捐金焚券”、口碑资料是说将账簿、文书纸约烧了。不管是焚券还